

战

孙皓晖  
著

之大争  
之世

国



大争之世

战国

孙皓晖——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争之世：战国/孙皓晖著.--北京：中信出版社,2016.8

ISBN 978-7-5086-6429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研究-战国时代 IV. ①K231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2714号

大争之世：战国

著者：孙皓晖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：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6.375 字数：123千字

版次：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：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：ISBN 978-7-5086-6429-3

定价：4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## 目 录

---

### 上篇 战国兴亡论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亡韩论：忠直术治而亡，天下异数哉 | 003 |
| 亡赵论：烈乱族性亡强国，不亦悲乎 | 011 |
| 亡燕论：辽阔固守王道的悲剧    | 026 |
| 亡魏论：缓贤忘士，天亡之国也   | 052 |
| 亡楚论：故楚亡楚皆分治      | 078 |
| 亡齐论：战国之世偏安忘战，奇也  | 097 |

---

### 下篇 战国人物论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布衣赴难：中国文明史上最绚烂光华  | 113 |
| 秦孝公嬴渠梁：政治天宇的太阳    | 119 |
| 吴起：为变法死难的第一个布衣巨子  | 125 |
| 墨子墨家：被历史速冻的烈焰利剑   | 138 |
| 吕不韦：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峰  | 150 |
| 荀子：战国最具独立品格的思想家   | 162 |
| 韩非《孤愤》：战国法家的命运预言书 | 173 |
| 赵雍：战国最为英雄浪漫的国王    | 184 |
| 赵佗：岭南文明的第一座丰碑     | 189 |

上篇  
//

# 战国兴亡论

好战者必亡，忘战者必危；国家生存之道，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。纵观中国历史，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，无一不因此迅速灭亡。

# 亡韩论

## 忠直术治而亡，天下异数哉

韩国灭亡，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。

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“命”（正式承认）韩、魏、赵为诸侯，至公元前230年韩亡，历时173年。韩国先后13位君主，其中后5任称王，王国历时104年。史载，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，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，遂以封地为姓，始有韩氏<sup>①</sup>。由韩氏部族而诸侯，而战国，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，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。

这两个枢纽期，既奠定了韩国传统，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，不可不察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史记·韩世家》“正义”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。又韩城在县南十八里，故古韩国也。《古今地名》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。”在今日陕西韩城县地带。

## 第一个枢纽期：春秋晋景公之世，韩氏部族奠定根基

其时，韩氏族群的领袖，是韩厥。

当时的韩厥，尚只是晋国一个稍有实权，封地不多，爵位也不高的寻常大臣。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（赵盾、赵朔）、重臣魏氏（魏悼子、魏绛）之权势封地，尚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是“韩厥公直，明大义”，在朝在野，声望甚佳。

其时，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，进而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。在这一重大事变中，韩厥主持公道，先力主赵盾无罪，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，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，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。这便是流传千古的“赵氏孤儿”的故事。后来，赵氏复出，屠岸氏灭亡，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，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。

韩氏地位一举奠定，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。

韩厥此举的意义，司马迁作了最充分的评价：“韩厥……此天下之阴德也！韩氏之功，于晋未睹其大者也（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）！然（后）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，宜乎哉！”

太史公将韩氏之崛起，归功于阴德所致，时论也，姑且不计。然则，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，却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。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，其后日渐清晰。韩氏部族从此成为“战国三晋”（韩赵魏）之盟的发端者，而后三家结



盟，诛灭异己，渐渐把持了晋国，又终于瓜分了晋国。

春秋之世，晋国为诸侯最大，大权臣至少六家。及至春秋末期，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，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。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，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。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，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，此所谓“德昭天下之功”。此后，韩氏节烈劲直，遂成为部族传统，忠义行为朝野推崇，以存赵之恩，以聚盟之功，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。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，“三晋”相对和谐，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，也是天下立起“三晋一家”口碑的由来。

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，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，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强劲的扩张活力。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记载韩国重地颍川、南阳之民众风习云：“颍川、南阳，夏人之居也。政尚忠朴，犹有先王之遗风。颍川敦愿……南阳任侠。故至今谓之夏人。”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，归于夏人遗风，应该说有失偏颇。战国大争之世，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，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，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、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。

## 第二个枢纽期：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

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，最大的战绩，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

一的郑国。

此后，韩国迁都郑城，定名为新郑。魏国也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，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。魏惠王时期，魏国多攻赵韩两国，三晋冲突骤然加剧。当此之时，韩国已经穷弱，在位的韩昭侯便起用“京人”<sup>①</sup>申不害发动了变法。

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，是“术治派”的开创者。术治而能归于法家，原因便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“行法”为前提，以力行变法为己任。在韩非将“术治”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（势治、法治、术治）之前，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囫圇看法家而已。究其实，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法治派商鞅，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。分歧之根本在于，法治派主张唯法是从，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。

这种分歧，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。

《申子》云：“申不害教昭侯以馭臣下之术。”

《史记·韩世家》载：“申不害相韩，修术行道，国内以治，诸侯不来侵伐。”

术治者何？督察臣下之法也。究其实，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。所以名之以“术”，一则，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；二则，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，需要很高的技巧，需要传授修习。就其本源而言，术治

---

<sup>①</sup> 京，战国地名，故郑国之地，今荥阳东南地带。

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，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、民众安定的根本。如此理念，并无不当。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。

所谓扭曲，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，一旦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，必然扭曲既定法度，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。所谓变形，是权术一旦普遍化，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，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，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。整个国家的治理，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。

申不害的悲剧在此，术治悲剧在此，韩国之悲剧亦在此。

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，术治大大膨胀。依靠种种秘密手段查核官吏的权术，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。由是日久，君臣尔虞我诈，官场钩心斗角，上下互相窥视，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，人人自危，个个不宁，岂能有心务实正干？权术被奉为圭臬，谋人被奉为才具，阴谋被奉为智慧，自保被奉为明智。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，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；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，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；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，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。一言以蔽之，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，是使从政者只将“全身自保”视为最高目标，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，荡然无存了。

术治派给韩国带来了深远的后患。

这个枢纽期，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。

其一，它使韩国吏治整肃，一时强盛而获“劲韩”之名，一改屈辱之局。

其二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，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。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，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，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，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！

两大枢纽期，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：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，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，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。但是，好像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，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，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。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：信奉权术很虔诚，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。

信奉权术之虔诚，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，也不再追求。由此，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，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。由此，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，屡屡遭遇滑稽破产，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。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：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，只要脱离实力，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。一只鸡蛋，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，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。

韩国的兴亡，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，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。

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，韩国急速衰落。其最直接的原因，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。战国中后期，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。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，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。在此目标之下，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：主动出让上党、派遣水工疲秦、增兵肥周退秦、韩非兵家疲秦，等等等等。其风炽烈，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，诚匪夷所思也！

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。

其荒诞，其可笑，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。

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，韩国不亦悲哉！

韩国的权术恶风，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：一个是韩非，将“术治”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，被后人称为“法家之集大成者”；一个是张良，历经几代乱世，而终以权谋之道，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。对此两人，原本无可厚非，倘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，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。

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，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。

韩国之亡，亡于术治。

法家三治，势治、术治皆毒瘤也。依赖势治，必然导致绝对君权专制，实同人治也。依赖术治，必然导致阴谋丛生，实同内

耗也。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，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。此千古兴亡之鉴戒，不可不察。秦韩同时变法，韩亡而秦兴，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，得以明证也！

# 亡赵论

## 烈乱族性亡强国，不亦悲乎

赵国的灭亡，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。

赵国的历史寿命有三说：其一，战国开端说。视赵襄子元年（公元前 475 年）为赵氏部族立国，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（公元前 228 年），历经 12 代 12 任国君，历时 247 年；其二，开端同上，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，历时 253 年；其三，三家分晋说，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（公元前 403 年），则其历时或 175 年，或 181 年。

从历史的实际影响力着眼，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。

邯郸陷落赵王被俘，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。

赵国灭亡，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。

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，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，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。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，赵国独对

秦军作长期奋争。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，赵国依旧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。此后形势大变，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，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，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。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，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，却都是形聚而神散，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。当此之时，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，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，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。应该说，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，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。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、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，而能使廉颇归赵，李牧、庞煖不死，司马尚不走，秦赵对抗结局如何，亦未可知也。

然则，历史不可假设，赵国毕竟去了。

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。

六国之亡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。

其间原因，历代多有探讨。西汉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，归结为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唐人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则云：“亡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北宋苏洵的《六国论》又是另一说法：“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。赂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！”苏洵儿子苏辙的《六国论》，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，



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，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，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。清人李桢的《六国论》，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。更有诸多史家学者，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，连带论及六国灭亡，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。

凡此等等，其中最为烁目者，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、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。这是内因论，内因是根本。尽管循着如此方法，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基，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。攻守之势也好，贿赂秦国也好，战略失误也好，不执合纵也好，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。

然则，内在原因之根基究竟何在？

三晋赵、魏、韩之亡，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，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。

历史地看，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，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。然则，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，三晋之亡，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。也就是说，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，是有极大缺陷的。这种缺陷，其表象是一致的：变法不彻底，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。然则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，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？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？